

※「畢來德與跨文化視野中的莊子研究」專輯（上）※

畢來德先生《莊子四講》
研討會引言稿：現今學界研究道家思想
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

劉榮賢*

一

畢來德 (Jean François Billeter) 先生研究莊子思想以《莊子》書的原始文獻為基礎，本人完全認同。研究任何古籍都必須以原書之文本為基礎，而且應以同一書中的其他文獻相互印證，這樣才能對該書的思想體系有較深入的認知。然而，研究《莊子》之時卻必須注意該書有〈內篇〉、〈外篇〉與〈雜篇〉的分別，這是先秦古籍中的特例。《莊子》書中內、外、雜的結構歷經了兩千多年，必然有其意義。而畢來德先生使用《莊子》書的原始文獻之時，似乎〈內篇〉與〈外、雜篇〉的材料是不加以分別的。〈內篇〉與〈外、雜篇〉的文獻在先秦思想史上代表不同時代階段的思想發展，〈內篇〉基本上代表莊子本人的思想，而〈外、雜篇〉應該是莊子弟子或後續學者的思想記錄，此事學術界已多有研究。從〈內篇〉到〈外、雜篇〉，思想觀念有所不同，而且呈現一個發展的脈絡。當然，如果籠統一些將《莊子》一書視為「以莊子為主的學派思想」之總集，或許也未嘗不可。只是其中從〈內篇〉到〈外、雜篇〉的思想史的脈絡就顯現不出來了。

二

畢來德先生在《莊子四講》¹中提到，將老、莊「看作是同一個哲學流派的代表

* 劉榮賢，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¹ 畢來德著，宋剛譯：《莊子四講》（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莊子四講》一書下文採隨文夾

人物，這實在荒謬，因為這一學派從未存在過，而且二者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所持的理念甚至完全相反」（頁 124）。畢先生的觀點本人完全贊同，而這也是本人歷年來研究道家思想時所秉持的基本觀念。

《老子》與《莊子》的思想在中國後代的思想史上幾乎被視為一體，稱之為「道家」，其實老、莊在先秦時代是不同的學術源流。畢先生提出老子主張「萬物有一本源」，而莊子卻沒有。這個觀點是正確的。老子思想站在統治者的立場，統治者必須掌握世界；因此其重點在於強調一個物極必反的「常德」，這是宇宙天地物極必反的規則性，而「規則性」必須由一個更高的「主體性」來規定。因此《老子》書第五十一章在「德畜之」之上有一個更高的「道生之」來作為創造萬物的本源。然而，莊子思想則是亂世之中一個士人的處世懷抱，沒有政治統御上的需求，只求內在生命與外在環境的和諧逍遙，因此莊子的「道」不是創造的本體，而是萬物生生不息的歷程。總結而言，老子思想是「君道」，莊子則是「臣道」，思想立場有所不同，這幾乎是老、莊思想所有不同的基源。

除了上述的「道」觀念之外，老、莊二者對「德」以及「精」、「神」等這幾個觀念的解釋也幾乎少有相同之處；且先秦時代的文獻或寓言中，從來沒有老、莊對話的記錄；另外最重要的是《莊子·天下篇》總評天下學術之時，老子和關尹被歸為一類，與莊周分屬不同的學脈。這都顯示先秦時代老、莊思想初起之時，二者實為不同的學術源流。本人有一文〈從老莊之異論二者於先秦為不同的學術源流〉，發表於《東海大學中文學報》第十二期（1998年12月），該文從許多角度尋找證據以證明老、莊思想原本並不相干。因此畢來德先生主張研究莊子不能與老子混為一談，這個觀念與本人近年來對莊子思想的研究是一致的。

三

另外也必須注意一個問題：那就是《老子》五千言與《莊子》書中所提到的「老子」或「老聃」，在思想上也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老聃可能是一個春秋晚期的人物，《老子》書雖然可能有少部分老聃的思想，然大部分的文本卻是出於戰國時代。《老子》書應該是「口傳」與「寫定」輾轉累積所形成的文本。主張「守

註方式。

柔」，反對戰國時代「取強」的政治趨勢，依託春秋時代的老子其人之名而形成的一部纂集之書。然而《莊子》書中不論〈內篇〉或〈外、雜篇〉所出現的有關老子的文字，卻都是基於莊子學派思想下以寓言形式所做的依託，這兩部分的材料在先秦道家思想的研究上應該是要有分別的。

四

畢來德先生在《莊子四講》中提到：「假如以為《莊子》一書有個文學外殼，而在它下邊有一個能夠以抽象概念來加以表述的哲學系統，那就只能誤讀《莊子》。」（頁 117）又說：「《莊子》乃是許多精確而可解的描述構成的多元的、開放性的組合。大部分內容都是以故事或是對話的形式呈現，因為這是其觀點最恰當的表現形式。而中國人似乎大都把它看作是一個深邃的思想系統的形象化的表達。」（頁 119）畢來德先生已經掌握了認識莊子思想，甚至是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關鍵。

中國人的思想在知識論上的需求確實比起西方人要低得多。西方人透過「思辨性的語言」建立一套「哲學體系」；而中國人則往往利用「文學性的語言」來呈現一種「生命境界」。這種現象在《莊子》書中尤其明顯。這原因在於中國人的思想通常是扣緊當時政治、社會的問題發揮，而不是針對一個客觀的「知識性論題」。中國人又認為政治、社會問題的解決其基礎決定於個人生命情態的展現。這就是《莊子》書不能以純哲學系統的角度來解讀的原因所在。而且，不但是《莊子》如此，幾乎中國的古代典籍都是如此。

由此可知，思想的「本質」會決定對此一思想產生認知相應的「方法」；而相反地，研究的方法也會影響到所認知的思想的本質。換言之，思想本質決定其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也會影響所研究出來的思想內容。莊子以及中國的某些思想內容是無法完全以現代哲學的思辨方式來分析的。就像畢來德先生所說：莊子的研究必須以「經驗」，尤其是「親身的經驗」才能體會其思想中所隱藏的內涵。如此，則使用西方思辨式的語言來研究中國傳統近乎生命境界的思想內容，是否是一件恰當的事情，恐怕是值得再加以思考的。

五

畢來德先生解釋「庖丁解牛」中的「臣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之時，將「道」字翻譯成「事物之運作」。這固然不能算是錯了，但是如果以《莊子》全書的整個語言意涵來看，似乎有進一步商榷的餘地。

庖丁將「道」與「技」對稱，「技」是形下現象界中的技術或技能；因此「道」如果翻譯成「運作」，運作也是屬於形下現象界的層次，這就失去了莊子以「道」、「技」對稱的意義。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我所崇尚的其實是道，只是我用技術把它表現出來。」

那庖丁所謂的「道」是什麼意義呢？從「庖丁解牛」一段及《莊子·內篇》的文字綜合來看：「道」指的是人的「內在生命」與「外在物性環境」基於天地之間自然氣化流動之下的同步運作。這似乎聽起來有點抽象，但這確實是中國人所謂「聖人與天地合流」的生命情態。在這裏《莊子》藉著「庖丁解牛」的寓言來描述一個聖人的生命境界。《莊子》書中的「道」通常指天地之間萬物的自然流動，但這不是一個現代的科學研究者所觀察的客觀物理世界，而是一個聖人透過對「感官」、「思維」的解構，回復到生命的本然而匯入天地氣化之後，所產生的生命與環境同步運行之時所呈現出來的生命情態。這種「道通為一」（〈齊物論〉語）的境界，中國人又稱之為「神」。因此庖丁才會說：「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又說：「官知止而神欲行。」

「道」這個字在中國的古典文獻裏本來就是很不容易翻譯的，原因在於翻譯必須落實在有限的事物概念之上，而「道」卻有涵攝一切的普遍意義。因此如果翻譯成「事物的運作」，似乎不十分妥當。本人不自量力，嘗試作以下之翻譯：「臣所崇尚的是與天地氣化同流的生命境界，只是我把它表現在殺牛的技能上。」

以上這個問題的討論也提示了一個研究莊子思想的角度：那就是在莊子所在的戰國中後期，「氣化」思想已經發展到一個可以「作為宇宙及人生的存在與運作的解釋基礎」的地步。而莊子尤其是先秦時代以「氣化」作為思想基礎的第一人。很多莊子思想中的元素都必須立基於氣化的觀念才能加以掌握。庖丁之所以能將殺牛的技巧做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正是其生命之躍動已進入與天地氣化同流的情境。用「天人一氣同流」（即〈齊物論〉所謂的「道通為一」）的角度來解讀中國的古代思

想，一直是西方學者較陌生的場域；但它卻是中國思想史的基礎內涵。

六

《莊子四講》中畢來德先生在討論「解讀與經驗相符」之時，主張「向文本投射我們自己先入為主的見解，讓我們的成見決定了我們在著作當中所看到的東西。這些成見往往對新的解讀構成了強大的阻力」，又主張「在詞法與句法所允許的範圍裏，經驗才是翻譯最終的根據」（頁 26-27）。畢先生的觀點十分正確，這也正是畢來德先生對《莊子》的翻譯工作中所呈現的價值所在。

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投射解釋者自身的觀點」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中國後代的注疏之學，即所謂「經解」，幾乎都是作注者自己觀點的投射，其目的往往在於反映注者當代的政治社會問題，通常是「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畢來德先生自己也提到魏晉時代的郭象（頁 119）。郭象的《莊子注》中有許多對《莊子》文本的誤讀與曲解，但卻打動了魏晉時代士人的內在心靈，成為《莊子》書歷來留存的第一本古注。反而超越了東晉時代被認為比較符合莊子原意的佛教僧人支道林的著作。

當然，透過對古籍的注解來發揮對當代政治社會問題的意見，自然必須將古代聖人的「生命境界」轉換成一套「思想體系」（畢先生也提到郭象的《莊子注》是一部「哲學性質的注解」，見頁 119 倒數第 8 行）。這是因為以注解古書的方式來表達對當代政治社會的關懷者，其所使用的方法通常是理念上的提倡，而不是生命境界的展示。因此對於《莊子》本身及其後代之注解在研究的角度上應該是要有不同的。

這就是為什麼畢來德先生在《莊子四講》中一再強調把莊子列入道家不但沒有任何好處，還會造成閱讀上的障礙（頁 125）。但是中國秦漢以下的思想史卻習以為常地將老子與莊子合稱為「道家」，從《漢書·藝文志》到《隋書·經籍志》以下，老、莊書在歷代官私目錄中都同屬於「道家類」，這當然有其學術與歷史上的意義。由此可見，後代學者對《莊子》解讀的觀點，與先秦時代《莊子》書本身所蘊含的思想內容，確實應該有不同的研究角度。

七

在《莊子四講》中，畢來德先生認為莊子是「以自己名義從事創作的作家中的第一人」（頁 121）。但是從《莊子》書的文本形式看來仍多「纂集」的痕跡，〈外、雜篇〉尤甚。其文本大多是由文氣不連貫的段落聯綴而成，不像是出於一人獨力之著作（〈雜篇〉中的極少數篇章可能例外）。先秦諸子是以「生活性的講學集團」的模式活動的（《老子》例外），因此其所流傳下來的文本大多出於弟子的記錄與纂集。本人倒是懷疑荀子可能才是先秦時代親身著作的第一人。《荀子》書之中除了少數材料之外，大多是首尾一貫的篇章，且其篇題與內容一致。這應該才是判別文本究竟是出於弟子所記錄，抑或是出於自作的標準。本人認為《莊子》應該還不是戰國時代學者親自著述的文本。